



經濟科學文庫
JINGJIKEXUEWENKU

中國GNP的分配和使用

郭樹清 韓文秀 著



經濟科學文庫
JINGJIKEXUEWENKU

中國GNP的分配和使用

郭樹清 韓文秀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156号

经济科学文库

中国GNP的分配和使用

郭树清 韩文秀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码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9.5 插页5

1991年11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2次印刷

字数: 189 000 册数: 4 001-8 000

*

ISBN 7-300-01184-5

F·333 定价: 7.50元

《经济科学文库》

编委会

主编

黄 达

副主编

徐安琳 樊 纲 魏 杰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庆泉	马建堂	贝多广
王松奇	卢中原	叶 坦
刘 伟	李 扬	李拉亚
李晓西	陈东琪	陈 莹
陈 淮	杨瑞龙	林 岗
金 碚	钟朋荣	郭树清
徐安琳	高海燕	常 青
梁 晶	黄小祥	黄 达
黄泰岩	蔡 昉	蔡重直
樊 纲	魏 杰	

经济科学文库总序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当今世界上有的人把经济学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们正在进行着经济改革，有关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切，总是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经济改革的成败，关系着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经济学家们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担负着无法推卸的重要责任，必须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为这一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部《经济科学文库》，就是对中国经济学家思维成果的记录，是为我国经济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服务的。

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伟大事业，不仅要求经济实践家们提出一系列直接针对当前现实问题的对策，也要求经济科学工作者提出一整套于理解现实问题有补、对解决现实问题有益的经济理论，作为战略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基础；同时还要对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用丰富、翔实的经验资料，对各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各种政策的有效性，作出检验。过去10年中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进入90年代，中

国的经济学家们正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上来。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改革事业和我们的经济科学将有更大发展的一个前提。《经济科学文库》作为一块新的科学研究园地,愿经济学家们的心血在此浇灌出更多、更美的鲜花。

《经济科学文库》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提倡追求科学、坚持真理、求实创新的学风,鼓励严肃认真的研究、扎扎实实的工作。相比之下,我们将更加重视研究成果的长久价值,希望今后人们能够看到这套丛书中的许多内容,经受了实践的长期检验而成为人类科学知识积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科学探索,就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只要是严肃的探索,即使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会因为向人们表现了“此路不通”而为其他人通向真理扫清了障碍。正因如此,我们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积极而严肃的学术批判和学术争鸣。我们将积极扶植学术新秀,使《经济科学文库》成为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一块新的出版园地。我们还将尝试一些评价学术成果的新方式,加强学者与出版界的合作,在制度上保证丛书的质量。

希望作者和读者与我们一起,关心、爱护这套丛书,共同办好这部文库!

《经济科学文库》编委会

1991年4月

引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感到，对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使用情况进行实证考察，是一项非常需要尽早着手的基础工作。但是直到 1989 年秋天以前，由于抽不出大量时间，这个愿望始终只是愿望，所不同的是，由于治理整顿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因而也是令人费解的变化和反应，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

中国经济研究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宏观分析，是在中断几十年之后，从 1984 年重新开始的。匆匆起步的宏观经济研究，很快陷入一种空前混乱的境地之中。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正处于迅速的变化时期，而传统的经验和观念仍然存留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与此同时，各种国外现代经济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如同潮水般破门而入，四处蔓延。于是，所谓新观点和新概念层出不穷，所谓新学派和新体系也竖起五颜六色的大

旗，争论和批评此起彼伏，披挂不及就匆忙上阵者有之，不知目标就挺身而出者亦有之，互相误解对方论点者更有之。由于上述原因，这种混乱不可避免，而且也很难说没有积极意义。或许，不经过这样的过程，我国经济研究就不可能回到现实，获得新生。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探讨和争论，我们应逐步在基本概念方面求得统一，应逐步澄清我国经济的基本事实，这样才能够从混乱的泥淖之中逐步摆脱出来。

经济研究中属于基本概念方面的混乱，近些年来正在明显减少，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例如，我国经济界长期形成一种习惯，把居民收入等同于居民消费，原因在于过去居民收入用于消费之后没有什么剩余，因此把居民收入称为“消费基金”，但改革以来，居民储蓄迅速增长，收入与消费的差额越来越大，再把二者混为一谈，就会造成严重失误。虽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不分其彼此。又如，经济学文献中经常出现所谓“国民收入流失”的说法。这种说法并不是指出于国际贸易或资本流动的条件不平等而造成的本国经济损失，相反是指本国收入分配中的不正当收入问题，如偷税漏税或滥发奖金实物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确切说法应当是财政收入流失（财政应得而未得）或企业收入流失（企业应留而未留），使用“国民收入流失”说法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不管谁得谁不得，或谁多得谁少得，这部分收入都参加了分配，都是“国民收入”。上述因素所改变的只是收入分配格局而非国民收入总量。再如，关于总需

求和总供给概念，更是众说纷纭，尽管这两个概念是从国外经济学中引入的，但是原有的规定却没有受到尊重，出现了“连续积累的总需求”，“即期总需求”，“有效总供给”、“无效总供给”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说法。这类例子还有许多。

基本概念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经济学和统计学概念与新引进的概念同时并存而未加区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经济界普遍接受了“国民生产总值”这样一个包括非物质部门生产增加值的总量指标，与此同时却继续使用原有的“消费”指标，后者仅包括物质性产品的消费，不包括对非物质部门生产的服务的消费。而与国民生产总值对应的消费指标目前既无统计，也无分析，甚至还没有得到界定。这两种意义的消费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很不相同。由于消费不清楚，储蓄也不清楚，不要说广义的国民总储蓄，就是居民储蓄存款，其增长变化也常常超出经济界人士的预料。1989年经济不景气，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不知人们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钱存入银行。同样，“进出口额”，在绝大多数经济文献和经济学家的头脑里，仍然是产品的对外贸易额，并不包括服务的进出口额。所幸的是，非贸易创汇额及其分类情况在统计中是有记录的，因此，如果需要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口径计算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总额，统计资料可以提供基础数据。

概念混乱还产生于经济学家的传统思维方式以及原有统计体系对经济生活剧烈变化的不适应。例如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积累（库存净增加），在过去我国的统计体系中和目前国际

通行的核算办法中,基本的规定差不多,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国目前统计数字不仅与国际上不可比,甚至与我国改革前的同类数字也不可比。其中仅通货膨胀因素未剔除就可以造成巨大差异,因为在两种统计体系中原则上都要求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也就是说,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中折旧额与净投资额时,不考虑通货膨胀造成的资产重置价格上升因素是不行的,计算流动资产积累(库存净增额)时,不考虑年末库存总额与年初库存总额相比因价格上涨而升值的因素也是不行的。显然,当通货膨胀率达到较高水平时,其影响也是十分严重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经济研究中的许多实证宏观分析常常显得矛盾百出,与实际经济运行相去甚远。这带有必然性。当消费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不清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变化不清楚,库存净增额也不可靠,进出口是顺差还是逆差也不确定时,又如何能正确把握宏观经济的态势呢?

许多时候,经济学家对引进的概念和方法的理解并没有太大偏差,但是,由于对国内现有统计资料提供的数据没有仔细考证,结果也往往得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这种失误最常发生在与各种系数或比率相关的问题上。例如,计算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时,虽然饮食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或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似乎都不难理解,可是,中国经济是一种高补贴经济,不考虑补贴,家庭收入或支出的结构和总量都会失去国际可比性。只有把国家财政和企业对居民的各种食物补贴、民用燃料补贴、交通及文化服务补贴,以及房租补贴等等都计入居民家

庭的收入和支出之中，才能计算出本来意义的恩格尔系数。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这样尝试过。又例如，经济学家们经常根据现行的统计数字，直接计算外贸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其与美国、日本的数字相比较，从而得出中国已经出现过度贸易的结论，殊不知中国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存在着低估服务业增加值，低估自给性商品生产和“影子经济”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可贸易产品率低，汇率特殊等因素，外贸总额可能高估，据此得出的结论就十分危险。再例如，关于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问题，人们往往习惯于只计算政府财政用于教育的开支，但是我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和管理体制非常特殊，除财政拨款之外，其实还有大量的非财政投入。工厂的子弟学校、农村的普通教育，其经费很大一部分是由企业和农民负担的。诚然，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中国的教育支出比重也依然偏低，但是只有这样计算，才能求得准确的数字。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投资率、投入—产出比、储蓄率、偿债率、债务率等等指标的计算和运用之中，几乎处处存在着隐蔽的陷阱或障碍，稍不谨慎就会误入歧途，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些问题，便是导致我们下决心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和使用情况进行实证考察的最初动因。

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是，当我们真正着手研究这个题目时，很快就感到如坠五里云雾，不得不暗暗叫苦。事情原来很简单。实际上我们要研究的不仅是国民收入分配使用问题，而且

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核算问题。我们闯入了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只好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首先了解 MPS 和 SNA 两种统计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规则要求，比较其异同，然后搜集各种可能搜集到的统计资料和调查资料，寻找某种换算的途径和办法。这些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犯了许多错误，走了不少迷路，可以自慰的是，这些代价迟早需要付出。

我们的研究是从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的：什么是国民收入？中国传统的国民收入概念与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国民收入概念很不相同，这是众所周知的。为了更全面更完整地了解收入分配和使用情况，我们选择了广义国民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整个分析过程的基本概念。但是，随后遇到许多麻烦。虽然现行统计中既有国民收入指标（属于 MPS），又有新近引入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但是中国从未有过收入分配结构的完整统计记录。例如，居民收入或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些十分基本的指标都是不存在的，而只有“农民纯收入”“城镇居民货币收入”“职工生活费收入”等等相关的但并不是近似的指标。企业最终收入和政府最终收入指标也是不存在的。曾经有过的物质部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统计，近些年也基本中断了。加之收入分配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可以说中国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情况基本上是不清楚的。

我们很快发现并因之陷入更大麻烦的另一个问题是，无论统计的国民收入指标还是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都存在着偏离定义的低估问题。对于前者来说，居民自给产品生产、企业以

实物分配形式分发的未纳入统计的产品、地下经济的生产、个体商业运输等收入的遗漏部分等等，都会造成低估；对于后者来说，除前述因素之外，还要加上对全社会固定资产磨损计提不足因素和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严重低估因素。后一项包括公有住房房租因补贴而造成的人为差额，自有房屋的“虚拟房租”，政府部门雇员报酬中非货币福利和补贴部分，等等。要调整增加这些内容，而又没有现成的统计资料，显然十分困难。不过，既然已经发现这些问题，要想回避是十分痛苦的，迫不得已，只能寻求迂回曲折的估算办法来逼近现实。这样，不知不觉我们从国民收入分配和使用问题回到了本来不是这项研究所应涉及的国民收入的生产问题。

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对通货膨胀的估价问题。尽管可以在许多时候不使用不变价格而使用当年价格进行指标分析或对比，但是有些问题是无法绕开价格变化因素的。例如对固定资产真实磨损的估价，首先需要知道固定资产重置价格，而重置价格必须依据通货膨胀率来计算；对库存净增额的估算，也离不开根据当年价格进行的调整。然而，我国的物价统计资料很不齐全，有零售物价指数而无批发物价指数，有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而无工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指数，产品的价格资料相对丰富一些，但服务的价格资料却十分缺乏。从理论上说，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按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数字和按不变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数，可以推算出所谓“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但是，对若干典型年份的验证表明，其偏差很

大。即使有一套可靠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因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例如前面提到的计算固定资产重置价格，所需要的是投资品价格指数或投资费用价格指数而不是一般的价格指数。在必须考虑价格水平变化情况而又无现成统计资料的场合，我们只能根据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推算，并反复比较、验证，以尽可能减少误差。

当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依据国际通行规则进行调整以后，分配和使用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因为生产多少必须分配多少，使用多少，这几个方面始终是平衡的。这带来了更多工作，因为必须将每一项分配和每一项支出都按照规范进行审查和调整。例如，居民收入，不仅要计算货币收入，而且还要计算实物收入，补贴和福利收入，不仅要计算初次分配收入，而且还要计算再分配收入。又例如，固定资产投资，必须对照国际通行概念，考虑现行统计的各种高估和低估因素，重新调整。然而，由于已有资料的限制，我们又不可能完全按照联合国推荐的核算体系进行调整，许多时候不得不寻求某种简化的途径。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划分收入分配机构部门时，我们只能以居民、企业、一般政府三部门来代替更详细的五部门，因为没有更详细的分部门原始资料。

两极相通。当事情复杂化之后，也展现了某种简便化的可能性。本来，国民生产总值生产帐户的调整必然要求分配帐户和使用帐户进行相应的全面调整，这引发了复杂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三个方面具有互相制约互相平衡的关系，反过来也

互相校正了各种可能的较大误差。储蓄和投资，净出口和国内资源平衡情况等等，都具有这种对应性质。凭借这些关系，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过去感到迷惑或模糊的经济现象的原因和影响，描绘出一幅更真实更详细的国民经济图景。

毋庸讳言，我们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仍然很不完善，存在着某些疏漏和失误，甚至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差错。

没有充分把握的推估主要涉及那些几乎没有统计资料可以使用的项目：首先是各种漏计的增加值；其次是投资费用价格指数；第三是全社会固定资产（包括居民自有固定资产）及其磨损率。有关的推估结果，有待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更深入的研究来检验。

我们曾经特别重视或追求的是，确定有关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使用的各种变量的数值，然而经过系列研究之后，我们的看法有所改变。事实上，目前具有第一位重要意义的事情，是理清这些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相互关系好比是构架，不确立起一个合理的构架，其他一切都说不通。因此，我们更注重把握在说明这些相互关系时是否迷失方向，而不是在推估具体某一变量在某一时间区域内的数值时大了一点或小了一点，尽管后一类问题也是我们关心并竭力使之圆满解决的。

按照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的特性，需要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专家使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基本手段来进行研究，可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具备这些条件。说我们不自量力，并不过份。我们迄今所

做的一切，无论对自己而言还是对经济学界而言，仅只是一个开头。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为将来的研究者们提供某种正面或反面的参考，那我们就认为这项工作成功的。

引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感到，对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使用情况进行实证考察，是一项非常需要尽早着手的基础工作。但是直到 1989 年秋天以前，由于抽不出大量时间，这个愿望始终只是愿望，所不同的是，由于治理整顿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因而也是令人费解的变化和反应，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

中国经济研究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宏观分析，是在中断几十年之后，从 1984 年重新开始的。匆匆起步的宏观经济研究，很快陷入一种空前混乱的境地之中。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正处于迅速的变化时期，而传统的经验和观念仍然存留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与此同时，各种国外现代经济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如同潮水般破门而入，四处蔓延。于是，所谓新观点和新概念层出不穷，所谓新学派和新体系也竖起五颜六色的大